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

Field Imag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编

何明◎主编

Editor-in-chief: He Ming

云南藏族木碗文化

The Wooden Bowl-culture of Yunnan Tibetan

李志农 刘虹每/著

Li Zhinong Liu Hongmei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编

何明◎主编

云南藏族木碗文化

李志农 刘虹每 /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云南藏族木碗文化 / 李志农, 刘虹每著. --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8.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
ISBN 978-7-5489-2666-5

I. ①云… II. ①李… ②刘… III. ①藏族-木制品
-手工艺品-制作-云南 IV. ①TS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0039号

出 版 人: 李 维 刘大伟
策 划: 吉 彤 高 伟
责任编辑: 张湘柱 吴 洋
责任校对: 于重榕 李江文
装帧设计: 高 伟 庞 宇
英文翻译: 毕晓红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编
何 明◎主编

云南藏族木碗文化

李志农 刘虹每 /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制版印刷: 重庆新金雅迪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16
字数: 54 千
印张: 7.5
印数: 1-2000
版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89-2666-5
定价: 98.00 元

为精神家园守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 序言

何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着人类的历史记忆，表征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构建着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迅速推进，把或隐或显的带有西方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现代性”商品、图像、技术、知识和思想在全球范围迅速扩散，悄然而迅速地吞噬与置换着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方化的同质性“世界图景”越来越明显而强烈地凸现出来，多样性的文化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与考验！

民众在行动，演绎出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大戏；国家在行动，推出一个又一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知识界在行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成为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作为以人类文化及其多样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和人类学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调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力军和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夜人”。

法国艺术大师罗丹曾说：“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长期穿行于山林田野之间并驻留于“他者”之中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 年 10 月 17 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三十二届会议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总则”第一条第一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家，以其特有的学科敏锐性不断地发现鲜为世人所知的文化事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亲临现场进行细致的参与观察，以撰写民族志的方式表述出来，使之成为“凝视”的焦点。“凝视”的后效在于：唤起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以自己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感到自豪，倍加珍惜与主动传承；拓展其他社会或群体的文化视野，产生文化震撼，尊重异文化，并转化为支持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

作为表征文化的符号系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深邃复杂的意义。若不做深入细致的阐释，人们难以理解其意义，也就无从感知与把握。“人类学写作本身就是阐释”。本套书系的作者们在对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过程性和细节性描述的同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意义阐释，以期增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进而推动保护实践的广泛有效展开。

以上便是本套书系编写的基本目的，也是表述方式选择的根本依据。

在文化多样性不断遭受现代性侵袭的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精神家园需要“守夜人”。我们愿意勉力为之！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第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目录

- 一 藏族木碗概述 1
- 二 云南藏族的木碗 11
- 三 云南藏族的木碗制作 21
- 四 木碗与生计 35
- 五 木碗与生活 47
- 六 木碗与信仰 59
- 七 木碗的流动 69
- 八 木碗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87
- 九 木碗产业走向何方 97
- 附录 云南藏族其他木制品简介 105
- 后记 109



藏族木碗概述

它们是指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马戎、潘乃谷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藏族人口的数量变化及其地理分布》，载《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2期，第2~3页。

根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页。

1. 藏族的自然、人文生态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主要分布在约占全国总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上。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五省区聚居的藏族人口约占我国全部藏族人口的99.8%。西藏自治区以及20世纪50年代陆续在青、甘、川、滇四省建立的10个藏族自治州和2个藏族自治县基本上是藏族传统的居住区域。除此之外，还有部分藏族人民与其他民族分散杂居在一起，并有一些藏族人民从藏区向内地和东南沿海等城市流动。另外，在与西藏自治区接壤的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和克什米尔地区，也居住着一定数量具有藏族血统的人口，其总数估计达百万人。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我国藏族人口共有6282187人，在全国人口数量中排行第八。藏族使用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为卫藏、康和安多三个方言，其中卫藏方言与安多方言差别较大，康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各方言区的藏族在语言、风俗、生计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别，体现了其族内大小支系之间的复杂性与差异性。

藏族聚居的这三大方言区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雪山、冰川、河谷、湖泊、草原、森林、山间盆地等汇聚一处，高山河谷并驾齐驱，多条大江大河源出于此。青藏高原及其东缘的川西、滇北高原等地区大部分属于高寒气候，太阳年辐射量大，年平均日照长，气温年差较小。但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和怒江、金沙江以及澜沧江“三江并流”的河谷地带，气候温暖多雨，土壤肥沃湿润，适宜于大面积的原始森林生长。

我国藏族聚居地区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为木碗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而藏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以及较为寒冷的气候条件等因素也促进了木碗在藏区的流行与传播。总体来看，木碗在藏区得以广泛使用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藏区丰富的林业资源为木碗的制作提供了基本的原材料。

藏区木碗制作流行的地方，多森林木材而少铜、铁矿石，这种情况在过去资源匮乏、交通不便、手工业不发达的时候更为明显。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食器具，瓷器在当时较为罕见，除了活佛、贵族、土司等权贵阶级以外，普通百姓很少能够使用。然而，藏区河谷地带丰富的竹木资源弥补了这一遗憾，大自然的馈赠使得当地藏民能够因地制宜地获得最适合他们的食具。

其次，木碗轻便、不易碎、易携带的特点满足了逐水草而居的藏民的生产生活需要。藏民的生计方式主要以游牧经济为主，藏民居住的绝大部分地区是不同类型的草原，如藏北草原、果洛草原、可可西里草原、甘南草原、阿坝草原以及甘孜地区的石渠、色达等都是宜于各类牲畜发展的天然牧场。因此，这里藏族人民的生产也一直以牧业为主。牦牛、犏牛和绵羊、山羊是很早驯化的牧畜。这些高原上的特有动物以它的肉、毛、皮、乳供应了藏族人民的生活需用，它们同时还是高原上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牧民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们。除此之外，在河谷及山间盆地等较温暖的地带也有部分藏族从事农耕或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他们种植青稞、小麦、荞麦、豆类及核桃、苹果、杏、梨等果树。“地理环境在根本上决定或限制了人们所能选择的谋生手段，而谋生手段则进而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藏族尤其是牧区的藏族的这种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要时常迁徙，而迁徙的流动性决定了他们除了家眷和牛羊以外，能随身携带的东西很少。但饮食器具是人类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物品，因此对于藏民而言，木碗这种轻巧便携、不易碎、耐用实用的食具能够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最大的效用。

再者，木碗不烫手、保暖性强的特点能够适应藏民的饮食习惯。

藏区的自然生态及高寒气候使得藏族习惯食用牛羊肉、糌粑、酥油茶、

《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4页。

石硕著：《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29页。

该观点来自〔日〕田畑久夫的《中国西南藏族、彝族的木器制作》，见袁晓文主编《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民族出版社出版，2010年9月版，第544页。

青稞酒等高热量的食物，配合这种饮食习惯，通常情况下，他们吃饭时会先倒一碗酥油茶，喝一小口后，抓一把炒好的青稞粉放在里面，用手搅拌均匀，再适当添茶或加青稞粉，接着用手指沿着碗壁揉搓，直到青稞粉变成一个半干半润的面团（即糌粑）后，再倒一碗茶，然后一边喝茶一边吃糌粑。几乎每一个藏民都有一个木碗，或者是一种“三件一套”的套碗。碗直接与人体的手、口接触，因此其触感对于使用者来说也很重要。陶瓷碗、玻璃碗或者后面出现的合成树脂碗传热性高，倒入热水烫手，而藏民喝酥油茶、吃糌粑时又习惯碗不离手，因此他们会更青睐于轻巧便携、不易碎、不烫手的木碗。

迪庆州博物馆里陈列的马锅头餐具，左边的木碗倒扣在右边的碗盒里即为“三件一套”的套碗



2. 藏族木碗的历史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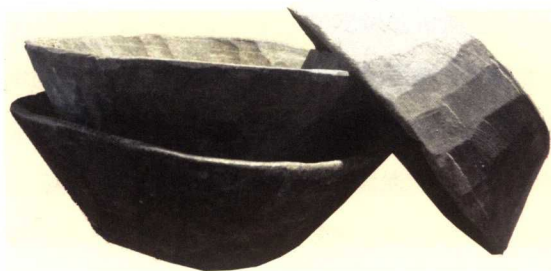
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饮食器具。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最为熟悉，却不普通，所谓“小器大用”。碗在汉字中的写法有很多，异体字有“盥”“𩰫”“碗”“碗”或“碗”等。碗的篆体字写作盥，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盥，小孟也，从皿，𠂔声。乌管切”。古时的碗也写作从“木”或从“皿”，说明这种盛食物用的器皿初始的状态中，曾经流行过石制的、木制的，只是到后来才变成了陶瓷的。当然，西南少数民族至今仍有剡木、削竹为碗的。

从我国出土的文物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有了木碗，“最早的木碗是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漆碗”，而现在能见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附检字〕》，中华书局出版，1978年3月版，第104页。

参见许逊：《话碗》，载《艺术市场》，2009年第8期。

赵菁著：《小雅大器：中国古代小木器集粹》，金城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275页。



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同乐村中保存完好的斧削木碗

到的最早的瓷碗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青瓷碗。“关于木器食具，韩非子《十过篇》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斫山木而财，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从上古尧舜时代发展至明清时期，木质食器深受人们喜爱。木钵、木碗的发展与藏族、蒙古族的生活习俗有关。特别是明代永乐时期，少数民族佛教徒自佛教圣地五台山等地进入中原，也促进了木碗的发展。”

赵菁著：《小雅大器：中国古代小木器集粹》，金城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275页。



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朱漆木碗[图片转引自赵菁的《小雅大器：中国古代小木器集粹》，金城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275页]

可见木碗是我国藏族最常用的一种餐具，但木碗并非历来便为藏族所独有。木碗的藏文写作 ཕ་པམ་，藏语称“泼巴”。藏族木碗的形制与汉地的瓷碗较为相似，唯独口沿外翻，腰腹鼓起呈弧形，底部圈足。并且，其形制在不同藏区还略有不同，如西藏阿里、左贡、那曲、加查等地的木碗与云南迪庆、丽江以及四川巴塘、理塘等地的木碗在口径大小、腰腹弧度、圈足高低乃至胎壁厚薄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常人看上去觉得差不多，然而不同地方的藏民和制作木碗的匠人一眼便

丹珠昂奔、周润年等编：《藏族大辞典》，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539页。

能觉察其不同。

藏族木碗的来历，在西藏加查县以及错那县等森林资源丰富的地区流传着一个相似的传说：从前藏区的牧民主要从事游牧业，手工业不发达，人们吃饭都用泥碗。然而泥碗既不结实也不卫生，喝奶、喝汤时间一长就开化，喝起来牙碜。有一年，一位（门巴族）木匠到森林里去伐木，喝水时不小心把泥碗砸碎了，这位聪明的木匠就临时加工了一只大木勺来使用。人们看到他用木勺吃饭，就建议他将木勺的柄去掉，渐渐地，人们将这种轻便耐用的木勺改进成木碗，并开始广泛使用。此后，人们就学着用木头做碗，并不断进行技术上的改良。

作为一种食器，木碗与藏民的饮食习惯息息相关。四川学者任乃强在《西康图经·民俗篇》一书中详细地描绘了民国时期西康地区的番人如何使用木碗：“番人概用木碗，为形与内地饭碗相似，惟口缘微反向外。番人各有一具，藏于怀中。食时取出，盛茶一碗。微呷后，取糌粑一握置其上，初浮如山，以右手食指入碗，沿口缘搅之，糌粑渐陷入茶，至于尽吸茶汁，成为湿面，则更加干面，反复捏之，使全碗皆成微润糌粑，乃以手捏成小块，如干狗矢，塞入口内咀嚼咽之。食尽，用舌舔碗内外使净，仍入怀内藏之。不用匕箸。亦不洗涤。”

任乃强著：《西康图经·民俗篇》，新亚细亚出版科，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
七月初版，第62页。



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木碗之乡”奔子栏村，村民旺堆为我们介绍了木碗制作的大致发展历程：最早的时候，人们是在一整段木头上挖几个坑作为盛食物的器具，因为这种盛食物的方法适

应于藏民喜欢围着火塘一起吃饭的习惯；之后在此基础上，又选择在一小段木头上挖一个洞，这便成了木碗的雏形，然而这样的木碗比较厚重笨拙，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再后来，意识到煮过的木头不易开裂且重量较轻易于进一步加工，如削薄、造型等，于是他们开始用水煮木头，再用刀斧等工具从木心处掏削煮后并阴干的木坯来制作木碗，这一阶段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大约到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则发明了一种脚踏设备用于旋碗，这种设备通常需要两个人相互合作，一人踩踏板，踏板通过皮带产生动力，另一个人就在刀片上旋碗，至此，木碗制作已脱离了纯手工阶段，开始向半机械半手工转变，制作工艺日趋成熟；直至今日，木碗制作早已用电动设备代替脚踏，而这又是木碗制作技艺的一大飞跃。

从旺堆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木碗因其轻巧便携、不烫手、不烫口、不怕摔等特性为藏民所钟爱，尤其适合在牧区仍以游牧经济为主，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的藏民使用。加上藏区多森林木材方便就地取材，木碗才会历经时间的筛选，在藏民的手中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

3. 藏族木碗的地域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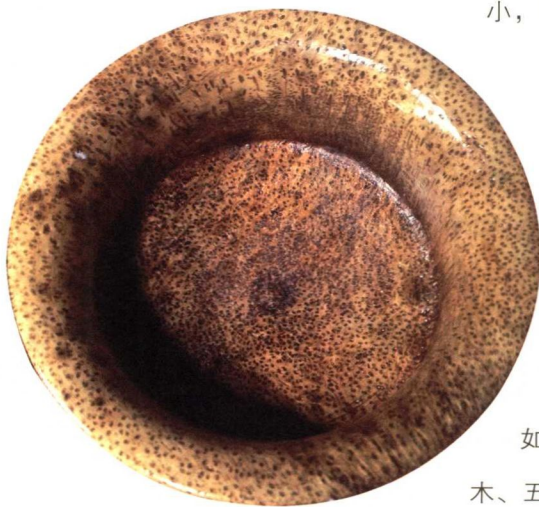
藏族木碗的使用遍及卫藏、安多、康巴三大藏区。“卫藏”在历史上是吐蕃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宗教文化中心，是藏族文化发育的摇篮，分为前藏（“卫”）与后藏（“藏”），其行政区划大致相当于今天西藏自治区除去昌都市以外的大部分地方，包括拉萨市、山南市、林芝市西部以及日喀则市、阿里地区等。“卫藏”藏区使用的木碗以阿里地区的普兰县以及山南市的加查县最为著名，其特征是碗口很大，圈足偏低，胎壁较厚，看上去十分粗犷豪放。

“安多”大部分地方属于牧区，其行政区划包括现在的青海省的

中甸县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2001年12月1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民政部批准，其正式易名为“香格里拉”县。2014年12月16日，香格里拉撤县改市，设立香格里拉市。

海北、海南、黄南、果洛几个藏族自治州以及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安多”藏区的木碗适应于牧区的气候以及牧民的生产生活特点，普遍属于小开口、低圈足、厚胎壁的形制，这样的木碗方便牧民在迁徙过程中随走随用，而不怕酥油茶冷得太快或四处乱溅。

“康巴”包括现在西藏的昌都市、那曲市东部和林芝市东部，以及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康巴”藏区使用的木碗以云南的迪庆、丽江，西藏昌都市的左贡以及四川的巴塘、理塘等地制作的最为著名，尤其是云南迪庆的奔子栏村与上桥头村生产的木碗远近闻名，其特征是碗口较小，圈足偏高，胎壁较薄。



西藏林芝市米林县木碗加工厂生产的竹料碗，因为材质与木碗不同，竹料碗的天然花纹明显成黑色点状（摄影：李锦萍、冯鑫）

除了我国的三大藏区以外，尼泊尔、印度、不丹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的部分地区也有一些高原和山地民族在使用木碗，其形制与卫藏藏区的木碗相似。三大藏区制作木碗的村寨一般集中在靠近森林、木材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方，不同藏区制作的木碗除了上述形制方面的区别以外，在选材上也有一定的差异。具体而言，诸如云南迪庆、丽江等地制作的木碗，主要是以杜鹃木、五角枫、核桃树、黄木等树木的原木或树瘤作为原

材料，而西藏山南、林芝等地制作的木碗，则多了一种竹料。西藏的门巴族就是以竹料制作木碗的代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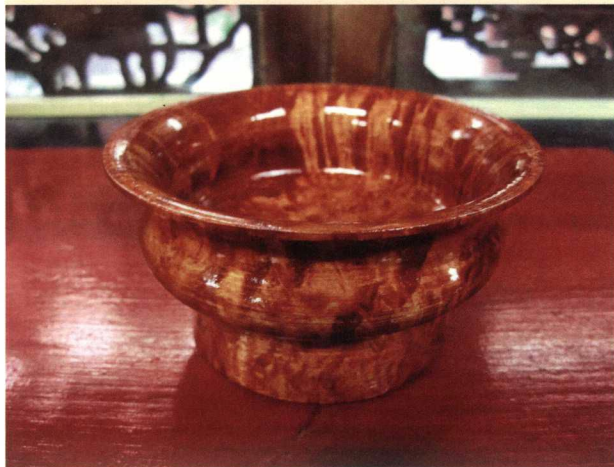
“门巴”原来是藏族对他们的称呼，意为住在门隅的人，他们与藏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聚居在西藏墨脱、错那、林芝以及察隅等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的河谷地带，这些地方生长着大片的原始森林，有十分丰富的竹木资源，且宜于农业种植。因此，门巴族除了从

事农业生产以外，还十分擅长编制竹藤器皿及制作木碗。门隅北端的麻玛村，便是有名的“木碗之乡”。门巴族用竹子制作的木碗，原料大多产自墨脱。这种竹料碗与木制碗的最大区别在于碗的花纹不同，因为材质差异，竹料碗的花纹呈现出黑色斑点状，而木制碗的花纹则是流线型的木纹。

从世俗和物质的层面来看，藏民可以在市场上购买符合自己喜好和需求的任何一个木碗，但是由于地域限制，一般他们也会优先选择自己所在藏区生产的木碗。木碗形制上的差别，主要是各个地区制作



西藏拉萨等地使用的木碗，其特征是碗口较大，胎壁较厚，圈足较低（摄自德钦县奔子栏益西藏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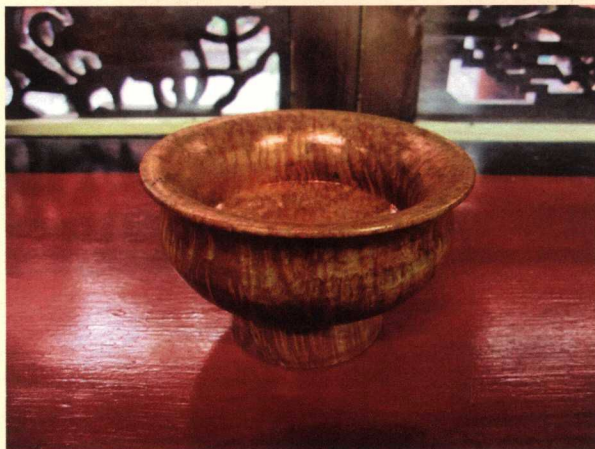


西藏那曲市使用的木碗，其特征是碗口较小，胎壁较厚，圈足适中且厚实（摄自德钦县奔子栏益西藏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西藏阿里地区使用的木碗，其特征是碗口较大，胎壁较厚，圈足适中且厚实（摄自香格里拉市尼西乡上桥头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廖文华家）



西藏昌都市左贡县生产的木碗，其特征是碗口较小，胎壁较厚，圈足适中（摄自德钦县奔子栏益西藏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木碗的匠人以及生产木碗的工厂根据本地的生态、资源、气候以及饮食习惯等做的调整，因此所谓的阿里碗、那曲碗、林芝碗、中甸碗等，也是木碗适应地方性差异的结果。



云南藏族
的木碗